



# 張雪門 (1891~1973)

台灣幼教傳奇

---

翁麗芳 撰文／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系教授



◆ 張雪門，1891（清光緒 17）年出生於浙江省寧波，1973 年逝於台北。

1967 年，張七十六歲，執筆《幼稚教育五十年》，自述二十六歲以前是家族長輩安排的人生，以後，是自己發現的人生。此時，張來台二十一年，右眼近乎失明狀態十五年，半身不遂七年。

張雪門享年八十二；借上述其自我回顧的人生切割，前二十六載在家鄉，是依著家族親長期望行動的人生；而後的二十六年上京，是擺脫家族束縛，立定研究幼兒教育之志，致力耕耘「中國的」幼稚園的人生；最後的二十六年，渡海赴台，秉建設「台灣」幼教之志，病體顛危，「隻眼隻手」撐持撰述，留史傳承。

以教育研究者臧否張雪門，可以定位其開拓中國大陸及台灣幼兒教育近代化發展之功；以師資培育角度研究張雪門，將注目其獨特的幼兒教師實習觀點與踐行；以近代中國人物論述張雪門，其一生可贊稱傳奇亦可嘆謂兩岸分隔的時代悲劇。

## 壹 生涯

開啟近代中國幼兒教育的張雪門，1930 年代與陳鶴琴（1892～1982）並稱「北張南陳」，二人號領中國的近代幼兒教育發展。生年僅一歲之差，二人同樣在傳統中國社會度過童年，在中年盛期活躍於中國幼教界，抗日戰爭之後，陳留居大陸，張渡海赴台，此兩岸分隔，卻演變成其後功名成就的明暗對比。陳鶴琴九十歲別世時具全國幼教研究會名譽理事長、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全國政協委員等高名，喪禮上九個兒女及數十子孫環繞之外，政教名流冠蓋雲集；早陳九年辭世的張，一女及學生淒清相送之外，未聞當朝顯貴置一言。兩人辭世二、三十年後之今日，中國大陸上「陳鶴琴教育思想研究會」以北京、南京為中心在各地積極辦理陳鶴琴教育思想研究活動，定期出版刊物，舉辦論文評選等活動，幼教工作者無不知陳鶴琴思想、事蹟者；張雪門在台灣僅一二歷史研究者繫掛，汲營奔徨於教育新潮中的幼教工作者，或知其名，罕追索其理念影響者。



然張雪門其人對於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幼教發展的影響確實不容抹滅。以下分寧波、北京<sup>1</sup>、抗戰、台灣四個時期追索其生涯。

## 一、寧波時期（1891～1920）

1891年張雪門出生於浙江省寧波。張家是世代經營當舖的殷實人家，張雪門是五人兄弟裡的長子，年少時<sup>2</sup>父親過世，張雪門以長孫身分備受家族期待，延師授課，傭僕環伺，卻也親身經驗大家族裡男尊女卑，敬老卻以不合理方式教養小孩的封建遺風；這大約是張對於「二十六歲以前是老家給我安排的」生活喟嘆的由來。（張雪門，1969，<sup>1</sup>）

張在寧波家鄉渡過的成長時期一如明清典型仕途，先接受家塾四書五經刻板卻嚴厲的課讀訓練，再到鎮上鄞山書院就讀，再插班入讀浙江省立第四中學，畢業即受聘執教。省立第四中學畢業前後，張雪門成親，對象是鄞山書院老師的女兒，據說老師是前清貢元深喜張而許配女兒<sup>3</sup>。這在當時中國社會本不足奇，然而顯然張將此事列為「老家給我安排的」事件之一，才有後來又娶幼稚園老師的另一段婚姻<sup>4</sup>。



雪門先生早年獨照。（翻攝自「張雪門先生紀念專集」）

### 寧波時期傳奇

1916年，張雪門依傳統虛歲算法二十六歲，傳奇性地邂逅了「幼稚園」，啟開其後幼稚教育人生之門。當時張之長子香山兩歲，孩子頭上長了癬子，一日，張帶孩子搭火車到慈谿的醫院去醫治。慈谿比起寧波是交通、資訊便捷的都會，文風盛，當時尤其多留學日本青年，醫院、學校，甚至當時希罕的幼稚園的設立都是開風氣之先。

1. 本稿地名之使用依憑史實；於1927～1949期間稱「北平」，餘稱「北京」；而重疊時期者以「北京（時期）」稱。

2. 據張雪門著《我的童年》，父親於十三歲時過世。

3. 張雪門著作雖偶有述及子女，但對於兩段婚姻無片紙隻字描述。此鄞山書院老師成為岳父事乃張之長子香山先生覆信翁時所述（書信日1988年11月26日）。

4. 同上注。

「到醫院時，本地人早已掛上號了。那時候醫生還沒有開診，我怕孩子不耐久等，便帶他出來，在醫院附近溜達。」走著走著，孩子突然在一個祠堂前佇立不動了。原來，祠堂裡是個幼稚園，「一位年輕的女教師領有八九個孩子在遊戲。」（張雪門，1969，<sup>2</sup>）

偶然邂逅「幼稚園」促使張雪門開始收集幼稚園相關資料。1917年張隨著寧波舊府屬的江蘇教育參觀團參觀上海、南京、無錫、蘇州、南通，見識最先進的各種不同的幼兒教育：有仿自日本幼稚園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操作恩物的「蒙養園」（無錫競志女學蒙養園），也有教會式的，彈琴唱平安歌，又活潑又有韻律的幼稚園（蘇州景海幼稚園）。參觀團回到旅館後屢屢針對各種型態幼兒教育優劣辯論，激發張雪門對幼兒發展、幼兒教育的興趣，開始購讀相關書誌。1917年，張也在家鄉寧波創辦星蔭幼稚園，而後又和友人合辦培育幼稚師資的星蔭幼稚師範學校<sup>5</sup>。

## 二、北京時期（1920~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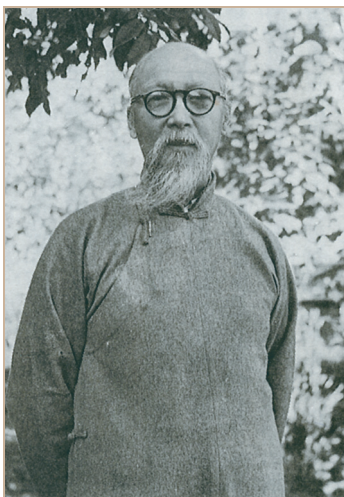
1920年，29歲，張雪門帶著朝教育之聖取幼教經典的念頭上北京：「北京原是全國首善之區，而且離天津又近，蒙養園和幼稚園比任何地方多得多」（張雪門，1969，3）。當時已經成家，在家鄉擔任過小學校長，辦過幼稚園及幼稚師範的他，先到新教育名校孔德學校（首任校長蔡元培）擔任小學部主任，1924年進入北京大學（簡稱北大）擔任註冊課職員。台灣光復後報界聞人洪炎秋，1925年進入北大教育系就讀，這樣形容當時的張雪門：

「每上教育功課的時候，總有一位註冊課的職員，在他點完了由他擔任點名的各個教室以後，就走進我們的教室，找個位子坐下，低下腦袋，專心一意，聽功課，記筆記。這個職員比我們學生約略大十來歲，瘦括括的一張淨白臉孔，配上他時常穿的那件灰色長掛，顯得既瀟灑，又厚重」<sup>6</sup>。

2. 據張雪門著《我的童年》，父親於十三歲時過世。

5. 有關星蔭幼稚園、星蔭幼稚師範學校資料來自張香山，推測民國初年新制學校制度初出現於中國大陸，張雪門以一己對幼稚園摸索中的興趣以及數年小學教學經驗，在鄉里仕紳的資助下試辦星蔭幼稚園及其人才的培訓機構「星蔭幼稚師範學校」；當時尚未訂有幼稚師範學校相關法規，如張雪門等有志教育者自行開辦學校者非罕；而張的著作中未有提及星蔭幼稚園、星蔭幼稚師範學校者，亦可藉為推斷張自身視此最早期的教育實踐經驗不夠成熟，不值錄述。

6. 此段文字取自於張雪門著，1970年文化圖書公司出版的《我的童年》，洪炎秋撰寫的「序文」部分。



灰布長袍，長鬚飄髻是雪門先生的「固定形象」。

圖：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提供

長袍馬褂，瀟灑頹然的讀書人氣韻是友人、學生眼中張雪門的固定形象。北京時期、抗戰時期以至張晚年台北育幼院時期的學生及院童，回憶起「爸爸媽」、「老院長」都是灰布長袍、長鬚飄髻的描述。

### 北平時期傳奇

張雪門進入北京大學，以職員身分旁聽教育系課程，展開幼兒教育理論學術研究又是另一則傳奇。

在一次參觀博氏幼稚園（後來「王府大街幼兒園」）後，偶然發現包花生米的紙竟是福祿貝爾（F.W. Froebel）教育講義，張雪門從這張紙追到福祿貝爾《母親遊戲》的注解本，「我無意中得到這本書，喜歡無量，進出都隨身帶著，遇空研讀」（張雪門，1969，4），鑽研過程中得著當時北大教育系主任高仁山的鼓勵，張一方面執筆翻譯福祿貝爾原作，一方面日以繼夜整理思緒、蒐集資料，研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教育。高仁山除了提供自己遊歷日本、英國考察幼教的筆記資料，還為張借來兩本蒙台梭利原著的英譯書，張因而在「中華教育改進社」發表「蒙台梭利及其教育」讀書報告；四十多年後，張在台北公開講演「蒙台梭利教育的影響」。

高仁山創辦道爾頓制實驗學校的藝文中學（後來的北京二十八中學），邀張雪門辦理藝文幼稚園。北平時期前期這一段接觸全中國（亦是全世界）最先進教育理論的經驗，應是影響張雪門後來（直到台灣）辦理幼稚師範教育的重要經歷。

1928年，孔德學校開辦幼稚師範科，併設於高中部，張雪門離開北大應聘孔德幼稚師範科主任，亦有稱此為孔德幼稚師範學校，稱張為孔德幼稚師範學校校長者。這一年張和幾位朋友成立了「北平幼稚教育研究會」。

孔德幼稚師範學校經營兩年後，1930年秋，張雪門受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長熊希齡<sup>7</sup> 邀聘編輯幼稚教育叢書，同時在香山慈幼院開辦幼稚師範學校，通稱「北平幼稚師範學校(北平幼師)」或「香山幼稚師範學校(香山幼師)」，是香山慈幼院五校中的第三校<sup>8</sup>。此時香山慈幼院的實際經營者是熊希齡長女熊芷，熊芷1927年方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修得社會福利碩士學位返國，一方面與當時同樣自美歸國的新教育學者陶行知、陳鶴琴等組織「中華教育改進社」，推動新教育，一方面接手香山慈幼院的經營，藉慈幼院當中的學校、兒童撫育、安置機構的辦理，試行理想的兒童福利制度的實踐。香山慈幼院第三校，即香山幼師，是中華教育改進社創辦的實驗學校，張雪門在高仁山引薦下加入中華教育改進社，大約也因此識得熊芷，受薦熊希齡。香山幼師創辦地點是離北平二十公里的香山靜宜園見心齋，採二年制，招生一班，21人。張雪門稱此創辦時期的課程為「半道爾頓制」，除了「幼兒遊戲」、「美術工藝」等課程是在教室講授之外，所有科目都採自動、合作、自主學習方式：每個月發給學生課程指導書，老師按日課表時間出席教室備學生諮詢，而學生自由出入，自主安排進度。此時張到北平十年，浸淫在當時教育學術界研討熱烈的美國新教育、進步主義思潮中，也參與應用美國的設計教學法、道爾頓制於中國小、中學實務的實證研究。香山幼師之實施道爾頓制，重視幼師生行為實踐以為吸取知識、技能、習慣、正是進步主義「做中學」的主張。見心齋因為地點偏僻，除了原來慈幼院的院生/學生住校之外，任課教師們也幾乎都住校，師生相處時間長，但是第二年，香山幼師遷校到市中心的帝王廟，因為交通方便，教師們多改為通勤，依授課時間來校，主張自由式學習的「半道爾頓制」因此無法撐持繼續。

1934年春，香山幼師改二年為三年制；張雪門聘上海工學團（陶行知創辦）戴自俺到幼師帶三年級師範生與北大農學院合作，在北平埠城門外羅道庄開辦「鄉村教育實驗區」，設農村幼稚園、兒童工學團、青年工學團、婦女工學團等。目的是要將上海工學團的「鄉村幼兒團」（簡易式幼稚園），「藝友制」（速成式幼師訓練）經驗實驗於北平；北平市裡香山幼師也實施「特約幼

7. 熊希齡乃民初財政總長、國務總理，1917年因華北水災，熊為收留水災孤兒而創辦香山慈幼院。

8. 香山慈幼院五校：一校為嬰兒教保院和蒙養園；二校為小學；三校為幼稚師範學校；四校為工徒學校；五校為工校。



稚園」實驗：城裡的幼稚園（如藝文幼稚園）是以中上家庭為對象，只有上午活動；香山幼師則借來利用下午空檔實施以一般家庭為對象的「平民幼稚園」；又安排香山幼師三年級學生在畢業前半年到慈幼院嬰兒教保院（第一校）及天津南開小學實習。總之，張雪門網羅各種資訊，構建各種實習場域與方式，讓幼師學生印證兒童發展理論。學生們在後來回顧此時的求學生活仍謹記張「不讀死書，要念活的課本—實習」（池寶華，1974，119）的教誨，對年不到半百，灰布長袍鬍鬚飄髻的張雪門愛敬有加，呼稱「爸爸媽」（參見下文肆之一）。香山幼師的自由人文氣氛可推想而知。

香山幼師是張雪門成就其教育理論的重要時期。雖然是其幼教人生的開端，然堪稱其終身教育理論主軸的「行為課程」架構已在此時期成形，邁入實驗、踐行階段。

### 三、抗戰時期（1937～1946）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日益強化侵華行動，華北地區首當其衝，身在北平的張目睹街頭日人猖狂，兒童受惑模仿，逐漸孕化出「民族改造的幼稚教育」觀，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後，日軍進入北平，對於深感民族存亡危機的張而言，留居北平，聽命日人是不可忍之事。在取得慈幼院熊希齡的同意後，8月，張雪門潛走上海。張與熊希齡商議在不受戰爭影響的南方，湖南，讓香山幼師復校，遂朝湖南長沙出發，而在長沙覓得校地正要開始復校工作時，長沙遭受日軍猛烈空襲，思考即使復校於長沙，亦招收不到學生，此時接到廣西省教育廳的邀請，張遂決定停止長沙復校計畫，改往廣西桂林。桂林雖然生活安定，卻是貧瘠之地，張再度回返長沙等候熊希齡同意桂林復校計畫，此時，卻透過報紙傳來熊希齡逝去消息。1937年除夕，張離開長沙，由廣州搭船到香港參加熊希齡喪禮。喪禮後，張得到熊遺孀毛彥文（接任香山慈幼院長）對於香山幼師桂林復校計畫的同意，並受任香山慈幼副院長職。1938年2月，在廣西省教育廳的協助下，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成立，開辦幼稚師範部（即香山幼師桂林分校），繼而4月在柳州開辦小學，成立香山慈幼院第二校桂林分校。

隨著戰火的延燒，1939年張雪門帶著香山幼師由桂林移轉古宜、丹洲，1942年1月再回桂林，所到之處皆致力於幼教師資培育與幼稚園事業的開拓，然於開拓的艱苦過程中，張興起經手、規劃錢財事情複雜，不符本性的感慨。此時陝西省正成立聯合河北省女子師範學院與北平師範大學之「國立西北師範學院」，擬在家政系設家庭教育實驗區，邀張雪門主持，張順勢以廣西省幼稚師範教育事業已告一段落為由，向香山慈幼院請一年假，1942年8月應聘赴陝西。在西北師範學院講授「兒童保育」、指導家庭教育實驗區一年之後，在香山慈幼院復職的催促下，1944年張赴重慶與熊芷會商。此時熊芷負責設在漢口的戰時兒童保育總會，推動以戰時孤兒為對象的「兒童保育院」工作，張因此在重慶不但負責香山幼師的復校以及協助兒童保育院的發展，同時也參與以最少經費普及幼兒教育的「幼兒團」工作。以張而言，幼師培育的「做中學」及普及幼兒教育的兩大理念再度易地實驗、踐行。

1945年8月10日，日本敗戰。1946年1月1日，張從重慶搭機歡喜返北平。

#### 四、台灣時期（1946~1973）

1946年7月，張雪門帶著女兒張玫搭機離開北平，經過上海，23日搭船到了台灣。船上吟成詩：

「八年離亂渾如夢，猿鶴蟲沙自不同，投老南來多感慨，河山長在淚痕中」（張雪門，1969，72）

張之離開北平乃因香山幼師復校計畫無緒，矢志之餘，接獲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兒童保育院院長之邀，遂決定赴台。1946年11月1日，張雪門上任「兒童保育院」院長，當時此院不但人事、設備全無，連場所都還沒決定；幾經討論後，張選擇台北北投為保育院地點，興土動工的同時也定下小學、幼稚、育嬰三部的組織架構，開始人事、課程等各方面籌辦工作。此縱向發展的三部組織在1949年2月奉令改為總務、教保、衛生、社會的橫面四部組織，有違張的原來構想。1947年4月，「兒童保育院」改名「台灣省育幼院」，接受全省各地孤兒。1948年1月，台中、高雄成立育幼院，台灣省育幼院遂改名「台灣省立





台北育幼院」。台北育幼院於 1946 年 11 月開辦幼稚部，由香山幼師畢業的姚潤珍<sup>9</sup>、袁孟英、李蟾桂負責；李蟾桂後來轉任台北師範專科學校（後來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現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實驗小學附設幼稚園主任。

1947 年 8 月，張雪門返大陸招募一同建設保育院人手，候得香山慈幼院學生池寶華、李蟾桂、華霞菱一同來台。華霞菱先追隨張在台北育幼院小學部任教，也負責導生班培訓少年幼教人才工作，1957 年隨家人搬遷新竹，轉任新竹師範專科學校（後來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現在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幼稚園主任，在竹師附幼實施張的行為課程。



1949 年張雪門院長（前排左二）與院中教職員合影。

圖：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提供

「當時社會上一般人只有孤寒的注意，卻忽略了正常和特殊的應有區別」（張雪門，1969，74）。張雪門一邊募款、覓足夠辦理嬰兒至小學教保的場地，一邊要募集兒童來院，更要思考如何設辦合理的、合需求的育幼院。對於當時的台灣民眾而言不僅不知保育院、育幼院為何物，不通台語、不諳日語的張雪門儼如異國來的奇特份子。張欲在當時的北投踐行

其教育主張，為台灣推動幼兒教育，協助民眾解決兒童教養問題實為難事。1946 年 12 月，張依據救濟總署台灣分署的統計報告，派一名醫師一名護士前往彰化接收中部地區估計有四十名的孤兒，「花了一個星期工夫，僅僅收到了三人，足見人民對政府疑懼的觀念尚未消除」（張雪門，1969，74）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張雪門等大陸來台、不通台語者處境艱難。北投居民知曉張之為人，安排張暫離保育院隱匿避風頭。然保育院內院童亦受風潮鼓動，小學部南部來的學生鬧回家，院內教師勸阻無效，急電張請示，「我想，從"二二八"以來，南北鐵路交通完全斷絕，到現在還沒有恢復。如果讓他們去，到了半途走不動了，勢必哭泣。路人如果知道是從本院跑出來的孩子，

9. 姚潤珍於 1 年之後，1947 年 9 月 16 日離職。由其香山幼師同學的袁孟英、李蟾桂接手。

總以為遭受虐待，那麼，本院的前途還堪設想嗎？我趕緊離開自治會館，剛走到鎮公所附近，碰見了老楊先生（本地人），他看我獨自走路，很驚訝地說，「喂！和平了嗎？」我只好含糊答應了一聲，仍向前行去」（張雪門，1969，75）

張返院親自與院童對談，先讓院童理解院方無攔阻之意，平服院童心緒，共同討論出由院童自己寫信給家長，請家人來帶回家的決定。過三週，諸家長推派一父親來。張指示同仁讓家長與院童共同起居生活，「一概據實答覆，不必掩飾，也不必和他說理」，結果兩天後，父親要離開了孩子全留下，那父親走前與孩子們相擁泣：「因為家裡貧窮，才送你們到院裡來受教養。院裡的衣食一切全比家裡好得多，而且還有書讀，病時還有醫藥，向這樣好的地方不會享受，還想到哪裡去呢？」（張雪門，1969，76）此二二八餘波事件對證出張的平實溫煦行政風格，張不但發揮領導人的果斷，化險為夷，更贏得人心。

光復初期的台灣，一般生活物質匱乏，出現棄養嬰兒問題，張思考「育幼院可以關起門來，當作封建時代的慈善機關，如殘留的育嬰堂孤兒院」（張雪門，1969，83），但是張認為新時代的育幼院當打開門，配合社會積極建設。當時經費拮据，申請入院者眾，又逢物價攀騰，於是1950年成立家長會，「會員本身，多半貧寒...家長的關心子女，何嘗會弱於我們。然而知能不同，對事對人有多少的距離」（張雪門，1969，87），張決定從家庭補助中開始實驗親職教育。換言之，張所經營的育幼院，一方面是收容無依兒童，一方面接受家庭有狀況兒童寄養，並且也開放社區接送幼兒上幼稚部，也運用做學教合一方法在院內外辦理導生班、幼兒團、兒童團，不但培養院童一技之長，也服務北投當地，成立「兒童福利協進會北投鎮分會」，台北育幼院「居然建樹起一個具體而微的兒童福利中心」（張雪門，1969，90）。

創辦育幼院之外，張雪門也受邀台北女子師範學校（後來之「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現在的「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幼稚師範科授課，參與、指導「中國幼稚教育學會」的幼教推廣活動。1950年起張雪門以通信方式指導台南師範學校幼稚師範科進行行為課程實驗。1952年張親赴台南師範學校三週，為暑期講習會授課。1952年青光眼開刀。



1953年張退休，台北育幼院及台南師範幼師科的行為課程實驗繼續進行，張雪門透過當面以及書信報告方式繼續指導，目的在：一方面訓練實際在幼教現場的工作者（台北育幼院的「導生」），另方面「對現任教員又可以作提高素質的修養」（張雪門，1966，序）。1952年10月《幼稚園行為課程》在台灣初版；1966年8月，《增訂幼稚園行為課程》初版。

退休後的張兩袖清風，搬離宿舍連住處都成問題。先有友人出借小房間供住，而後是王介容、李蟾桂、華霞菱等門人不忍終身奉獻教育的恩師晚年竟居無定所，集資於北投大屯山麓興建一屋贈，張稱此石頭建材之屋為「石室」，石室之小廳名「誰來堂」，約有今日此堂屬我，他日又不知此堂屬誰的無常感慨（台靜農，1973，1445）。

1953年空軍婦女反共聯合分會在台北設辦「空軍子弟育航幼稚園」，為了照顧更多的軍人子弟，1954年春，在劍潭成立「第一幼兒團」，其後，國防部在各眷村普設幼兒團。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妻尤祥雲委請的推廣幼兒團主事者，王介容是空軍眷屬也是香山幼師畢業生，1949年來台後也曾投訪台北育幼院，張指命其推動台北育幼院幼兒團工作。有此淵源，張樂見國防部的幼兒團普設計畫，不但親自擔任顧問參與，並且1954年10月開始主編《幼教輔導月刊》，刊載幼兒活動教材，並且藉書面傳遞幼師教學、親師溝通技巧以及深入淺出的幼教理念；1953年9月28日至1954年6年期間，張並且在《中華日報》擔任每週一「幼教之友」專欄編輯，書寫「幼教問答」等幼教師參考文。1960年7月19日，張正在準備《幼教輔導月刊》第72卷發行工作，中風昏迷，送醫急救。月刊第72卷8月號成為最終的休刊號。《幼教輔導月刊》編輯期間，張還接受僑委會邀請，執筆《函校通訊》，為華僑提供幼教理念。出院後的張半身不遂，卻重新學步，終至可以自行坐起，自行走路，精神復原，而行動卻從此不便。



雪門先生於北投大屯山石室外獨影。

圖：王靜珠女士提供

1972年4月15日，張逝於台北和平醫院。人生最後十載歲月，出入醫院，偶有學生、客人來訪，也偶有門人故舊等合力扶帶張到溫泉旅社沐浴，然門人以足不出戶於石室形容之。

## 五、生涯回首

張雪門的一生，北京時期，應該是重要的轉戾點。上京之前是依家族親長期望行動的人生，北京之後是避秦禍顛沛流離生活，渡台後，又遭病恙，力不從心。下面兩段文字正可為北京時期的關鍵意義做個對證：「父母因我在本房裡是長孫，進出都派人監護，要出門先須換衣，寬和溫柔，與人無爭...直到了四十七歲，退到大後方，才遭到各種困擾」（張雪門，1982，92）四十七歲，正是1937年，開始抗戰流亡生活之年，除教導學生之外，肩挑慈幼院興辦等行政角色時期。

另一段初到北京時對於幼稚園教師角色的觀察文字：「教師對孩子們的態度，在南方時我只知道一種高高在上教學生的尊嚴態度，此外只有眾星拱月一般和藹態度。但在北京卻發現教室裡孩子們各玩自己的教具，教師只記自己的筆記，彼此不相過問的冷靜的態度」（張雪門，1969，3）

第一段是回溯生活處事經歷，第二段是在幼兒教育研究上的視點轉折，北平歲月，顯然成為張雪門人生關鍵。

## 貳 張雪門與「中國的幼稚教育」

1919年的五四運動被視為是科學、民主的近代思潮進入中國的劃時代事件，此新思潮以美國文化為主，也包含進步主義、學生主體的「新教育」思潮。1919年，正是張雪門定居北平的前一年，還在家鄉執教小學，正摸索幼稚園、幼稚師範教育實務。

張雪門與齊名的陳鶴琴、陶行知都是推動近代幼兒教育、學校教育扎根於中國的重要人物。中華教育改進社（主任幹事陶行知）是當時中國教育界的領導組織，以陶行知、陳鶴琴、高仁山等留美青年學者為主要成員，發行《新教



育評論》雜誌，向中國教育界介紹兼且試行美國「新教育」理論在中國實施可能性的實驗。陶行知、陳鶴琴不但引介美國「新教育」，擔任1919年起兩年期間美國新教育學者杜威（John Dewey）在大陸講學時的翻譯，也是後來推動「平民教育」的聞人。1927年，陳鶴琴、陶行知等發起成立「中國幼稚教育研究會」，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幼教研究團體。留美學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的陳鶴琴投入此研究會活動對中國幼兒教育學術研究是一大刺激；此後陸續有「中華兒童教育社」等各種兒童教育研究團體的出現，呈現二戰前中國教育界熱烈兒童研究的風潮。

張雪門活躍於華北，陳、陶以華南為主要舞台；張受教高仁山，間接受陳、陶的西潮薰陶，但幼教師資培育的踐行，以及對於鄉土的親近與專注甚於陳、陶。陳自抗戰後也重視幼教師資培育，也開辦過幼教師範學校，然在1919年自美歸國的前十年專注於中國兒童發展理論。張、陳、陶在同時代的中國大陸各立下豐碩輝煌的教育偉業，三人事業交集於「平民教育」、「平民幼稚園」、「鄉村幼稚園」。

試以「奠定中國本土幼教發展根基」、「研創『行為課程』」、「倡導兒童本位與民族本位幼兒教育」、「倡導重視幼教師資培育」四大貢獻論評張雪門與「中國的幼稚教育」。

## 一、奠定中國本土幼教發展根基

1930年代，幼兒教育界「北張南陳」的美稱已形成，張雪門與陳鶴琴，一北一南，各領風騷。

當時大都會裡幼稚園、蒙養園已漸增多，然而內容多模倣日本或直接間接取材自西洋傳教士翻譯之作：「我常從幼稚園和小學校的遊戲中，搜求現時一切的教材，除少許自己的創造以外，大半都是由於外國翻譯出來的。這些翻譯的原料，不論感覺的、節奏的、矯正的、計數的，以及一切的表情的遊戲，可說幾乎全出於各國地方民間的流傳；…為什麼外國民間所流傳的遊戲可以充幼稚園和小學校的材料，中國的倒不可以採用呢？」（張雪門，1930a，565）

對於當時模倣日本的幼稚園，張雪門批評教師只知模倣談話遊戲等日本式之技術，不知其意義；對於直接間接效法西洋的幼稚園，張雪門指出缺陷：「(一)效法西洋，直接者較少，大多出於留華西教士之指示（我國近年來雖不乏外洋求學之士，但為數過少，其影響不在此），兼以時間過短，故僅模倣其皮毛，而未窺其原則。(二)且各種制度具有時間空間之限制；教育亦制度也，故不能離環境而獨立。模倣抄襲，自難合於國情。(三)模倣之弊易流於機械，馴致屏棄本國有用之材而惟外人之馬首自瞻。」（張雪門，1930b，112）

1927年，陳鶴琴在《幼稚教育》月刊創刊號上提出十五條適合中國國情和兒童特點的幼稚園的具體意見「我們的主張」；同一年在《教育雜誌》上發表的〈幼稚教育之新趨勢〉中，也同樣表達對於當時幼稚園束縛於模倣，忽視周圍的自然及社會環境的不滿。

張雪門因緣際會，生逢西方的「幼稚園」教育理論傳入中國之時，幼時飽覽中國經書，及長得親近西方實驗民主、科學的教育理論機會，在其未曾輟斷的幼教推展及幼教師資的培育工作中，張氏幼兒教育、幼教師資培育理論醞釀、浮現的同時，奠定中國本土的幼教發展根基。

1994年，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由張雪門當年舊屬戴自俺、學生金恆娟等組成編輯委員會編纂《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在編者說明中除了讚揚張「治學嚴謹、著述豐富」外，「特別是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幼兒教育事業，有重要的參考借鑑價值。」今日中國大陸的幼兒教育事業繫連於戰前張、陳、陶教育奉獻的事實無法抹滅。

## 二、研創「行為課程」

「行為課程」是張雪門的幼兒教育理論，研究起始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其後又有「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主張的發表（1933年提出於北平，見下文），而此種種思想的精進皆延伸成為後來「行為課程」的理論基礎。依張的詮釋，行為課程乃本於王陽明的「行乃知之始，知乃行之成」及杜威的「學本於做」思想，溶合儒家知行合一與西方近代經驗主義哲學形成其幼兒教育觀。



雪門先生重要著作。

張雪門主張幼稚園透過自然的生活過程幫助孩子成長，「行動」是幼稚園課程設計的唯一原則，是連結幼稚園教材與教法的主要中心；幼稚園教師必須研究幼稚園課程的內容與方法，此不僅幫助孩子成長，也是教師自身成長的主要途徑。

張雪門將幼稚園裡教師與幼兒的角色關係分為管理、教導、養育、衛護四者。養育和衛護是指教師提供安全、衛生環境、保障幼兒身心健全的發展。管理之目的在使兒童養成有規律之生活習慣。管理之方法乃由教師計畫，兒童組織（師生共同商議），然後教師以身作則和兒童一起做。教導（不同於「教學」）之目的在使兒童學習新事物，強調幼稚園教師必須在勞力上勞心。事先準備、臨時指導、事後批評與記錄是三個必要的工夫。每一行動都必須有重點有步驟。步驟分：動機、目的、計畫、實行、批評五步。前三者是教師用心又用力；實行是兒童用力，教師用心；批評教師與兒童都用心。所以教師光用心或光用力都不行，心、力太過也未必可收回成效，在勞力（實施）上勞心（應用理論）才是最理想，最有效率的。

幼稚園教師當研究幼兒的身心發展，從幼兒的生活中取材、設計、引導幼兒的行動、紀錄、評量，此循環是為「幼稚園行為課程」；而幼教師資培育也當運用行為課程，讓幼師生思考問題、試作、再思考、再討論，這就是「幼稚師範行為課程」。總之，行為課程主張有意義的行為，所以必須透過思考，這樣篩選之後的行為才有學習的價值。

### 三、倡導兒童本位與民族本位幼兒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張體悟「中華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關頭」，幼兒教育當幫助兒童成長，但不應完全以兒童為本位；當以民族的存續發展為目標，研究幼兒教材，組織幼稚園課程，以引起兒童貫徹教育目的的各種行為。促成

張民族本位幼兒教育發展的直接因素是 1933 年香山幼師帝王廟時期的幼兒遊戲事件。

一日下午，張雪門到藝文幼稚園，老師敘述當天上午幼稚園幾個小孩手持棍棒自稱「我是日本浪人」玩鬧，勸阻無效經過。張因此深思幼兒的模仿，「即使處罰或講解，以落在第二義，必須予以較高的觀念，否則下一代的前途將不堪設想」，因而提出「民族改造的幼稚教育」，目標在於：喚起民族自信心，剷除民族劣根性，培養客觀態度、團結習慣、自動能力、勞動生產的興趣，向帝國主義奮鬥。使用鄉土流傳故事與名人童年故事為教材，讓兒童產生敬仰先人之心，提升民族自信心；進行投環打球、秋千浪木的體能活動，鍛鍊/訓練幼兒眼力瞄準與四肢平衡感等技能，強健體力。

1933 年張提出「民族改造的幼稚教育」，1937 年 7 月 8 日，在北平召開的教育學會及中華兒童教育社年會中針對學前幼兒應否注意民族改造問題熱烈辯論，而其後蘆溝橋事變起，戰況愈趨激烈，更加強張改造民族以救民族的信念。

張雪門在《幼稚教育五十年》中記載了此時期他和熊芷對於香山慈幼院蒙養園實驗民族本位幼兒教育的辯論以及蘆溝橋事變後，他帶著一個小女孩在北平到天津的火車上遭遇日本憲兵的驚險經過，申張其民族本位主張的應然意義。當時熊芷結束美國留學，考察歐洲後返國。返國後一直居住南方<sup>10</sup>的熊芷，1937 年春，突然回到久違的北平香山慈幼院，「聽見蒙養園小朋友的“打倒日本”的歌聲，又從連、安兩位教師知道正在實驗民族改造的幼稚教育，見了我就說：“現在蒙養園所施的教育，從我們大人看來，不過是提倡民族精神，但傳到孩子們，就變成了一鬼子頭當皮球，我要剖鬼子的心，抽鬼子的肚腸，未免太殘忍了。”」（張雪門，1969，23）張雪門分析熊芷對華北情形隔閡，而有此想。

這一年 7 月，蘆溝橋事變，張雪門在教育學會及中華兒童教育社年會上提出的學前幼兒民族改造問題辯論未決，8 月，張決定離開已受敵軍監控的北平，計畫路線潛逃上海。臨走前，受託帶蒙養園當年畢業生慶寧。當天，到了車站，

10. 推測「南方」是指上海。





「日本憲兵和偽警分列兩行」，人人自危。在等火車開行時，「慶寧一個不小心，把小銀幣掉了。大家都幫著她尋覓，怎麼都沒有找到，急得慶寧直想哭。有一個日本憲兵給了她一個雙毫的日幣，她才不做聲了。憲兵叫她唱歌，她唱了。又叫她再唱，她也唱了。唱了又唱，我心裡萬分焦急…好容易等到火車開動…到得天津法租借時，是已經開燈了…我問慶寧，怎麼不唱打倒日本。她說：「我不敢」。」張雪門因此堅定民族本位幼兒教育的實驗是成功的：「孩子自有思考，適應環境。而且民族改造教育第三條目標，原是培養民族客觀態度，本是不斷地須用思考的…前些時，有些大人們對於兒童的種種疑猜，實在是多餘的。」（張雪門，1969，27）

張註明 1971 年 6 月 26 日執筆的「志道依仁」，文末寫下：「適應兒童、接近兒童、發現兒童、再把握兒童以求進展」（張雪門，1982，184）

#### 四、倡導重視幼教師資培育

張雪門的幼教師資培育理念可歸結為「行動中心」與「民族改造」兩大理念。行動中心即是「行動中學習」的原則，包括：實習中心、生活教育、教學做合一的三個理念，也就是張雪門研創的行為課程的實施原則。重視幼兒教育，希望藉幼稚園教育的普及、推廣，進行「民族改造」；而欲普及幼稚園、幼兒教育，就必須培育師資人才。張雪門身體力行其追隨先哲的「知行合一」、「做中學」、「學中做」，不放棄任何培養幼教人才，推廣幼兒教育的機會。身體狀況尚好的在台前期，在繁忙的台北育幼院擘劃工作中規劃幼兒團導生班的小學畢業程度的幼教人才，也在台北女師及台南師範幼師科執教，培養專科程度的幼教人才。二者學歷上雖有軒輊之分，然張均秉實習中心原則，兼以啟發討論，諄諄善誘。1953 年張退休，張透過當面以及書信報告方式繼續指導台北育幼院及台南師範幼師科的行為課程實驗，目的在培育師資人才，一方面訓練實際在幼教現場的工作者（台北育幼院的「導生」），另一方面「對現任教員又可以作提高素質的修養」（張雪門，1966，序）。這些書面對談資料便彙整成書藉以擴大為用：1952 年 10 月《幼稚園行為課程》在台灣初版，1966 年 8 月，《增訂幼稚園行為課程》初版。

1952年3至9月，張接受社會處委託辦理「保育人員訓練班」又是別於師範幼師科與育幼院導生班的幼教師培訓。利用台北育幼院的幼稚部的「幼稚園和全托的雙重現成的環境，運用做學教合一的方法，六個月內修完了參觀、參與和支配三種步驟」（張雪門，1969，90）。張對於訓練班全員二十人除三人因調訓關係返原職之外，十七人都由台北育幼院完全介紹出去，其後甚至還有機關來函邀聘之事難掩欣喜。無論何種背景，張一秉取用當地人才，就地辦理幼兒園，做學教合一，學歷背景或許不高，然訓練顯然嚴格，藉挑培育人才重擔。

今日中國大陸上眾所稱揚的幼兒教育家陳鶴琴，歷史定位之一是1940年創辦中國史上第一所公立、專設的幼教師資培育機構江西省立實驗幼稚師範學校；然而早其十二年之前，張雪門不但開辦孔德幼稚師範學校，並且發展出「騎馬應從馬背上學」的半日授課半日實習的幼教師資培育理論與教材；這個重視實務實習的幼教師資培育方式，隨著張的足跡，一方面從華北播種到廣西、陝西、重慶、台灣，也因地制宜，做出鄉村幼稚園、平民幼稚園、幼兒團種種不同程度幼教師培育的對應。台靜農便稱讚張雪門具備教育家學問、理想、實踐的精神，一生「學」「行」未曾分開過，所到之處便播下幼稚教育種子，「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有一批弟子與他共甘苦」（台靜農，1973，1442）

## 參 張雪門與「台灣的幼稚教育」

張雪門在台的幼教生涯，可比擬為本土化、民主化，以及「兒童本位」幼稚園課程的播種、耕耘；另一方面，張逝後，1980年代迄今台灣本土化幼兒教育的飛躍性發展，可視為萌芽後的茁壯成長。

張雪門在台灣，雖然時運不濟，正是歷經少年（寧波時期）的實際經驗、中壯年（北京時期、抗戰時期）的研讀與開創理論之後，醞釀畢生學術與實務鑽研成果時期；時運不濟，是指日治與國府交替，正逢台灣近代史上最動亂時期，社會未能理解幼兒教育，當權者無緣賞識幼教先驅張雪門。於張個人而言是未能居要職有所發揮，然台灣幼兒教育的歷史發展而言，此時期因有張的親手指導、踐行幼兒教育、親筆留述台灣幼兒教育的紀錄、批判與期許，張雪門



「批判日治時期教育」、「奠定幼兒教師專業」、「留史傳承，植根鄉土幼兒教育課程」、「強調幼兒教育目的」、「開路兒童文學」意義重大。

## 一、批判日治時期教育

1946年二二八事件後，張雪門撰寫了一篇「救救台灣兒童」文章，批評日本人對台灣兒童的教育只重手技術的傳授，不重腦；「只有灌輸，沒有啟發；只求服從，不求思考」（張雪門，1969，77）；「站在教育的立場上，總應該有一項共同的認識。這認識便是怎樣肅清日人奴化政策…今日台灣應有的教育可分消極和積極兩面。消極方面，如剷除日語，糾正思想…積極方面，我覺得至少需培植起四種精神：第一是主動精神，第二是組織精神，第三是創造精神，第四是工業化精神」（張雪門1969，78）。



1948年月雪門先生（後排蓄鬚者）與各部畢業兒童合影。  
圖：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提供

台灣的幼稚園教育起於日治時期，日治四十餘載期間也逐漸普及幼稚園、托兒所；張雪門對於此引進幼稚園之功未予置評，容或不夠公允，然其對於日本式「用手不用腦」，不容台人思考的教育批判卻也一針見血。此固由來於張的民族改造、民族本位幼兒教育信念，然不失教育學者重視兒童身心發展立場。

## 二、奠定幼兒教師專業

張雪門堪稱台灣第一位幼兒教育家。日治四十餘載期間日人雖然建立幼教發展雛型，然終始未嘗有幼教師資培育機構的設立，更無幼兒教育學者長期駐台；光復後，1947年台北女子師範學校設置幼稚師範科，延請張雪門開課：教育概論、幼稚園教材教法、幼稚園行政、兒童保育和實習。此約為今日台灣幼教師培課程的濫觴。當時的十所師範學校中，除了台北女子師範外，台南、高

雄女子師範學校也開辦幼稚師範科。1950年起張雪門也以通信方式指導台南師範學校幼稚師範科。光復前期幼稚師範科存在時間未長，1955年台南、1956年高雄女子師範學校停辦幼稚師範科；1965年台北女子師範學校幼稚師範科也停辦。張雪門之前，台灣沒有專長幼兒教育的學者；張雪門去世十七年之後，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等始開辦幼兒教育學系。

稱張雪門為台灣第一位幼兒教育家，除對照其獨有的幼教理論之外，也參照其身體力行，為培育台灣幼兒教育人才殫盡心思的事實。因為張雪門，1950年代的台灣南（台南師範幼師科）北（台北育幼院）同時發展幼稚園行為課程實驗。茲簡摘張與台南師範幼師科及台北育幼院的幼教相關討論過程如下。

1952年暑期，張在台南師範學校幼稚師範科（以下簡稱「南師」「幼師科」）授課三週，北返一週後，先是該校幼師科主任呂達（李海琴）來信詢問「幼稚園行為課程與設計教學法的關係」，繼而是閱讀過張、呂二師往來信函內容後，學生派代表執筆再向張提問，張覆信並且褒勉有加，回顧此事時不但不提此時工作繁雜身體衰弱事實，僅記述見學生提問，與學生問答之樂。1953年，張退休，但是當年9月台南師範學校幼稚師範科（以下簡稱「南師」「幼師科」）的行為課程實驗更上一層樓。當時台南師範學校校長朱匯森同意幼師科成立實驗幼稚班，請張雪門指導幼稚師範科學生進行幼稚園行為課程；目的是「加強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術的聯繫」。張因此為當年該科三年級學生編寫了十週的行為課程設計。

張雪門對於當時台灣幼教師資素質雖無直接批評，卻非無知。譬如《幼稚教育論叢》針對當時進行中的幼稚園「發現教學」的論述裡，紀錄郭彜提及：「目前師資素質較差，做研究實驗工作，十分吃力」（張雪門，1982，170），顯然張掌握現場狀況。在幼稚園工作上，張主張以兒童為主體，教師必須有明晰的思想和行為思考；在培育幼教師資上，張主張以面對的各種素質、各種背景的幼師學生為主體，強調師培者必須「學思並用」，現身說法對應各種資質的幼師或學生，敲扣啟思。



### 三、留史傳承，植根鄉土幼兒教育課程

張雪門在其 1955 年前後為僑委會執筆的《幼稚教育講義》第六講中，借某華僑女士的提問描繪當時四種形態的台灣幼稚園課程的混亂現象，並提出他的看法：

「第一種幼稚園是實驗興趣中心課程：一個班級裡兩名老師。幼兒們有的看圖書，有的繞著桌子騎三輪車玩，有的畫畫，有的在地板上搭積木……。一名老師在和三個幼兒講故事，一名老師站在角落裡記筆記。

第二種是國民學校幼稚班的分科教學課程：以小學的教學方式進行範讀、合讀再拆開來唸音的教注音字母的課程，然後教師再講故事，再教唱歌。都是老師教，幼兒跟著學，但是教的注音字母或故事或唱歌，彼此之間都沒有關係。

第三種是五指活動課程：教師先講解『貓』的特徵（貓眼睛的變化、貓的趾掌和走法），最後並做總整理。然後是休息時間戶外遊戲，教師和幼兒們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再回教室上課時，教師說的是『兩隻貓的故事』……。

第四種是單元設計課程：首先教師和幼兒們一起商量活動主題（如何招待來參觀的客人），教師引導幼兒計畫活動內容、地點（到什麼地方做送客人的禮物、畫送客人的畫、做遊戲。唱歌……），擬定計畫後，教師依照計畫分組，逐項讓幼兒進行。」

「幼教的課程，在目前（翁注：1955 年前後）的台灣雖然很複雜；但重要的只有兩種：一種以行為為中心（即自然課程）……凡幼稚園裡布置教室、開會、旅行、種花、種菜、養兔……只要孩子們能夠自己做的，都應該讓他們實際去行動。……第二種是以教材為中心（即人為課程），有了教材，再來研究動機的引起，過程的安排……，但教材是固定的，絕不因兒童實際的倡發活動而有所改變」

「分科教學是以教材為中心，單元設計是以行為為中心；興趣中心說是行為而偏又分科，五指活動說是教材（中心）而偏又完整」

張又批評：「今日教材的缺乏難免濫竽充數」，而且，「究竟教材是固定

的，要想適應幼兒活潑的行為，儘管教師如何注意教法，終是把教材和方法兩者分開，究竟不如訴之於幼兒自己的思考行為，才能把材料和方法打成了一片。」

上述清楚明確的紀錄是台灣幼教發展史研究的珍貴史料。長期的學術研究與踏實的實務工作背景，張不但具備敏銳確實的觀察力，所到之處提筆留記，並且必研發最適合當地風土人情的幼兒活動課程。台灣在日治時期雖有史誌記述幼稚園、托兒所的建置與成長，卻無若上述張文對於課程的翔實記錄與分析；張雪門在台的幼教建設工作或許有驅除日本遺風還其中華民族的目的，然其珍愛眼前台灣兒童的至情至性栩栩如生。

#### 四、強調幼兒教育目的

「民族本位的幼兒教育」成為張雪門幼教觀的顯著標記，然而張並非忽略幼兒身心的稚幼柔軟，勉強灌加國家、民族框架於幼小心靈的軍國主義或政治附從者；觀其一生，強調幼兒身心發展，強調鄉土，強調實質是其始終不變的主張，「民族本位」乃反映其所處背景的時代產物，與其批評其民族主義，毋寧注意其對應時空背景的幼兒教育目的觀。1967年，台灣推行「文化復興運動」，張雪門針對中國幼稚教育學會響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指導，充分顯示其所主張對應幼兒身心發展的民族本位的幼兒教育目的觀。

1967年中國幼稚教育學會邀請張雪門專題講演「從文化復興運動講到幼稚教育今後應有的動向」，引發會員（幼教師）熱烈迴響，後續「應怎樣計劃，能把文化復興在幼稚園、托兒所實施？」；「怎樣



1952年雪門先生（第一排右五）與台北育幼院小學部第一屆畢業生合影。

圖：王鳳女士提供



1952年台北育幼院導生班附設幼兒團第二屆畢業生合照，雪門先生為後中蓄長鬚鬚者。

圖：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提供



對幼兒講文化復興」的延伸討論源源不絕。張雪門針對「怎樣對幼兒講文化復興」提問的回答正可鑑明他之理解幼兒，尊重幼兒，茲引錄其中片段如下。

某園長批評年輕導生的教學：「文化復興的意義不夠強烈顯明」，張提出意見：「這（文化復興）本不是講的問題，而是行的問題，根本不是說話教學，而是行動的實踐（行為課程）」（張雪門，1982，120）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土地和五穀）次之，君為輕。』...在幼稚園裡應變成『兒童為貴，設備次之，老師為輕』」（張雪門，1982，124－125）

教材是教育的工具，教法是教育的方式，強調「儘管工具和方式並不一樣，但總結必須歸到國家」，「而且尤其重要的在於教師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張雪門，1982，90）

中日戰爭、亡國之痛的親身經歷，導致張雪門從幼兒本位轉向強調國家、民族的幼兒教育目的觀；然而，強調幼教師必須清楚在幼稚園裡的教育目的，轉化為課程讓幼兒透過行動達成。

## 五、為兒童文學開路

張雪門在來台初期擔任過國語日報兒童周刊編輯。當時張正主持從嬰兒到十一二歲小學生的台北育幼院，目睹院裡小學生對於作文不知如何下筆的苦惱，便「想給兒童周刊開一條路和兒童寫作連接起來，並特別提出從兒童行動中取材。」（張雪門，1982，94）

張雪門從浩瀚的舊詩詞、書畫中根據兒童經驗選材，編輯兒童讀物，引導兒童領略古詩畫的趣味，自喻「引路的成人」（教學者）要預為兒童安排環境「取材、造材，確定中心思想和佈局分段種種的工夫」（張雪門，1982，94），在與小學生的自然互動中開始其寫作教學的實驗。

實驗寫作教學一年多以後孩子們作文力增進，投稿受刊於國語日報兒童周刊，「從此，我就將兒童寫作連接上兒童讀物的路，同時也打通了用兒童讀物促進兒童寫作的路，更以之次激起國民學校的小學生。」（張雪門，1982，98）

在缺乏兒童讀物的四、五十年前的台灣，張將開闢兒童讀物之路喻為科學之路，欲將兒童讀物開向科學之路必須先拋棄重視形式枯燥無味的教科書，從兒童行動上引起兒童不斷的觀察實驗、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張在 1960 年代前期執筆的「石室啜拾」中敘述 這一段兒童讀物開路的思考與經過時，自喻為開路人，但是，「問題不在開路，卻在於走路的人。路是由於人走出來的；無路有人，可達太空，有路無人，荊棘叢生」（張雪門，1982，106）

台灣風土、科學、文學持續出現在張晚年的幼教論述中，除了為台灣文學開啟新路，也見證張與時俱進，不固步自封的研究者性格。

## 肆 願為兒童共珍攝

### 一、典型在夙昔

七年海外此栖遲 萬里空餘故國悲

老樹浮雲春寂寂 落花流水雨絲絲

夢回小閣三秋病 愁絕蕭齋一夕詩

願為兒童共珍攝 暫時相別莫相疑（張雪門，1969，96）

1953 年，張雪門退離台北育幼院時，作了此留別同人及家長詩作。由《幼稚教育五十年》可以窺知張的退休其實是遭人中傷，在時不我予感懷下的淒然決定。此詩作於退休惜別會後，張強掩傷感倉惶回宿舍，思及七年任內同仁及家長的合作，懊悔疏忽表達，遂書此詩留贈。雖是安慰同人傷別之作，溢顯張的敦厚性情，「願為兒童共珍攝」道盡張雪門一生幼教情懷。

「雪老平生喜飲酒，除此別無嗜好。未病以前，我們相遇時必得小飲，尤以二十年前的台北還是安靜樸實的都市，小酒館既不煩囂，公賣局的清酒也遠比後來的好。他晚上醉了回去，搭上火車就酣睡，到了北投不知下車，到了淡水還不知下車，車上人都走光了，才被車長發現」（台靜農，1973，1444）





台靜農是張雪門北平結交的友人，1946年來台，執教台灣大學，是張在台歲月中稀少的故舊之一，張罹病前還時相酒敘，病後則是台到北投訪張或是書札往還，除了上面關於張與老友怡然飲酒，歡然酣睡的描述之外，台對晚年張的觀察：「已經半身不遂，雙眼等於失明的狀況下，還寫出幾本書。別人寫作日以千言計，雪老寫作日以數十字計，而他不以為苦，一點一滴的將他的理論與經驗寫出來，傳給下一代」（台靜農，1973，1444），張雪門矢志教育，傾力傳承幼兒教育的固執，躍然而出。

張雪門一生著述豐碩，抗戰之前的北京時期著作最豐盛，當時的《幼稚教育新論》、《幼稚園課程編制》、《幼稚園小學校故事集》等十三冊書多由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出版，也有香山慈幼院出版的英文翻譯書《幼稚園原理與實施》；而後抗戰烽火流亡之際也不停筆，台灣時期則有二十一冊書，一百二十四篇文章<sup>11</sup>。

張雪門先生事蹟的追尋、研究，始於1980年代我在東京大學研究所時期。追索台灣幼兒教育的發展當中，「張雪門」在戰後，尤其是光復初期有限的台灣幼教論述中屢屢出現。追索其人，乃抗戰前與陳鶴琴、陶行知並列的教育界知名人物；奇的是，海外研究近代中國教育、中國幼稚教育史者莫不知陳、陶，於張雪門卻是「知其人，不知其事」的模糊狀態。追究起來，當時對於清末民初中國新教育的探討研究，依憑的是中國大陸及歐美、日本的資料。陳、陶是民初的留美學人，是以尤成為海外研究中國教育的焦點對象，而張雪門1946年渡台，其後事蹟在中外完全空白，無怪乎難下手論述。當時東京大學恩師松崎巖教授與我對談研究時，對於張雪門深感興趣，鼓勵我深入追索，是我研究張



1960年教育部梅貽綺部長頒贈獎匾給張雪門（左）

圖：中國幼稚教育學會提供

11.此乃張香山「傳薪哪惜山河遠」文中「據不完全統計」。戴自俺主編（1994）。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 下卷。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1449頁。

雪門的關鍵。其後翻閱張作，穿梭在簡潔清朗，道理晰明的文字間，感動其幼教情懷之外，不由不感嘆其傳奇般的人生際遇。事實上，在我蒐集相關資料，研究張雪門期間，也有幾則奇遇。1987年在東京看到電視報導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張香山訪日新聞，電光石火，此「香山」莫非是彼「香山」，追索而去，一年之後竟得在東京與香山先生會面而有其後張雪門戰前著作的入手；再有透過東京大學研究陳鶴琴、陶行知學伴，得與戴自俺、錢玲娟等前輩人物相見於北京，而有後來二戰前後兩岸張著作的匯聚，兩大冊《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的出版。

張雪門生涯記述主要依據張自身著作及其門人錢玲娟、金恆娟等人的追憶著述，部分材料來自 1988-1992 年間我做的人物訪談筆記。雪門先生著作以幼教論史為主，在自身及家族經歷年代部分未見明確交代，對照相關人物的著述或口述資料間偶出現不一致處；因此本文在張生涯記述部分有我直接推算者，也有在文獻對照間篩選其一使用者。1960、70 年代前兩岸處於封閉、對立關係，當時在論述間隱而不談或想當然爾之添加筆自是難免，這些小出入益顯特殊的時代感覺。

二十餘年前開始追索張雪門人生軌跡，在投入台灣幼教師資培育，並且參與各種幼教推廣工作的今日，重拾舊記，再探張雪門，三四十年，甚至逾半世紀前張所指陳的中國的幼教弊病，宛如指責現在台灣的幼教界。這是如何的因緣？晚生半世紀的我，該如何勾勒這樣一個幼教師資先驅者的形貌，如何論結這位前輩人物呢？

台北育幼院小五的謝富子這樣形容八十歲的張雪門：「我們的院長有很長的白鬍子，他早晨起來，先把自己的臉上擦乾淨，鬍子擦乾淨，再把他房子中的桌子、椅子、床架都擦得乾乾淨淨。...院長愛喝點酒，從前常常有老秘書陪他喝，客人來了，請客人喝，小朋友要求喝，他也讓我們舔一舔，他不喜歡別人喝醉了。…」（陳約文輯，1974，178）。



張雪門先生過壽照。（推測約 70 歲）  
圖：王鳳女士提供



1932年進入香山幼師的王介容在1949年來台後又進入台北育幼院跟隨張雪門主持幼兒團，描述幼師時期「四十歲左右，卻蓄留著長鬚」的張雪門：「是我們的校長，也是我們的班導師，而且親自教授我們幼稚教育課，照顧我們日常生活。因為校中另外尚有一位張先生，所以我們親切地尊稱雪門師為『老張先生』。老張先生訓練我們是極其嚴格的，他要我們手腦並用，會說會做，會計劃也要會行動。同時他因材施教，對我們全班十二位同學，都有不同的訓練。」（王介容，1974，112）

「雪門師老覺得我們辛苦用功，所以有時夜晚，他常會來探視我們，還帶著自市上買回的熱包子、燒餅，我們都已上床，聽到他腳步聲走近，我們會唱兒歌，學貓叫來歡迎他，他輕扣著門，並不進來，從門縫中塞進熱氣騰騰的大小紙包，大家一窩蜂從被窩中躍起爭食，雪門師這才含笑離開我們，安心去休息。他像是我們的嚴父，又是我們的慈母，我們親暱地稱他：『爸爸媽』」（王介容，1974，113）

張長子初次目擊「幼稚園」的寧波傳奇是開啟他進入幼教研究的人生重大事件。那個當年兩歲的長公子張香山在七十五年以後追憶此事：「父親帶我坐滬杭甬火車到慈溪的情景，我至今仍深記不忘，因為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坐火車，也是父親唯一的一次帶我旅行」（張香山，1994，1446），情深緣淺的父子，七十餘年歲月裡緊緊兒子心頭的是生命中唯一一次的親子出遊回憶，對於父親銘感深刻，造成家族生命轉折的「幼稚園」卻不復記憶。張香山戰後出任中日關係組織要職，1988年以長者身分接受我晤談時，文質彬彬，無政治言語卻難掩對父親的孺慕之情。我真實痛感兩岸隔絕的時代悲傷。

## 二、追仰先驅，鑑思今日

張雪門將在大陸發展形成的「行為課程」、兒童本位、民族本位的幼兒教育觀、幼教師資培育理論等帶到台灣；囿於時勢，有生之年未見輝煌。試從2007年今日台灣觀點，以「幼教與照顧」、「幼教師資培育」論結張雪門的見地以為其幼教先驅定位。

## （一）幼教與照顧

幼托機構的教育與照顧功能分野是今日幼兒教育政策的重點。六十年前，台北育幼院草創時期，為了推動幼兒教育，以孤兒為對象之外，也開放當地居民申請。

1948年2月單身母親陳女士寄信台北育幼院，說明遺腹孤子即將滿月，請求育幼院托養。張回覆一以嬰兒營養費省府尚未確定，二以不符公費生收容條件，婉拒托養請求。這是在政局尚屬動盪，台北育幼院組織定位不明，經費拮据時期，身為院長必須有的處置，然此事縈繞不去：「育幼院所負的使命，本來應如陳女士所說，為職業婦女和孩子們造福，...現在社會已經有人認識了育幼院，而且已經送上門來，我們僅因為嬰兒營養費未經核定的關係，輕輕地說一時無法收容；這還成甚麼話呢！嬰兒最好的營養固然是親母的奶汁，但人生走到了欲自乳親兒而不可得時，這又是多麼沈痛的悲劇呀！」

張雪門創辦台北育幼院草創時期乃以「育幼」，以推展幼兒教育為目標；其所謂嘆協助婦女育幼使命與今日所言之幼兒托育照顧不謀而合。

## （二）幼教師資 培育

台靜農稱讚張雪門具備教育家學問、理想、實踐的精神，一生「學」「行」未曾分開過，所到之處便播下幼稚教育種子，「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有一批弟子與他共甘苦」（台靜農，1973）。

1950年，張雪門受台北女師聘，因為正是台北育幼院人力吃緊時期，張無法抽身外出兼課，遂情商同意學生到台北育幼院上課的辦法：將學生分為兩組，上下學期交替在女師及台北育幼院上課。台北育幼院的全日托兒的育嬰部及幼稚園作為幼師科學生的實習場地，張並且在其餘時間指導教育概論等課。此雖是無法分身之應變計，然此兼顧理論與實務之師資培育是台灣幼教史上絕無僅有事例。逾半個世紀，台灣幼教師資培育提升至大學階層，然理論與實務之隔閡成為重點問題。再以新創師資檢定考試制度而言，考試與人才合用意義頗見



紛爭。1970年代台灣師資培育史上亦曾辦理過檢定考試，當時時空背景與今日大不相同，然張留下之警語卻宛若針戳今日問題：

「據聞此次辦理經過，筆試在先，試教在後，筆試不及格者不得應試教檢定...對於有些應試者望梅不足以解渴，豈能無『名存實亡』之感？...僅從文字而檢定者，豈不有庸師易得，人師南求之歎！抑更有進者，經過此次檢定，未合格之師資處置問題，也應加以考慮。按照目前一班家庭情形，幼兒父母多出外就業...不能不歸功於私人幼稚園的普遍。可是檢定之後，合格和未合格者，既難毫無軒輊，又不能處籠過嚴，影響私人辦學，怕有投鼠之忌。」（張雪門，1973，186）

雪門先生文簡質樸字字珠璣。譬如記述北京時期香山蒙養園兩個老師到北平藝文幼稚園看到孩子們進行「結婚」活動的生動活潑，「連師為充實活動內容，再參考書籍，不但記錄各項活動...幼兒方面興趣濃厚，有時竟因活動正進行熱烈，但放學時間已到，不願結束反而流淚」（張雪門，1982，108）讀來宛若今日流行之開放教學記述。站守二十一世紀台灣幼教研究、師資培育崗位一席的我，追撫先哲陳年舊記，戚然懺然。🍵

## 參考文獻

- 王介容（1974）。永不熄滅的幼教燈塔。載於張雪門先生紀念專集。台北：治喪委員會編印。112～116。
- 北京市教育學會 陳鶴琴教育思想研究會編（2006）。鶴琴之聲 第二十一期。北京
- 台靜農（1973）。記張雪老。載於戴自俺主編（1994），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 下卷。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1443～1445。
- 池寶華（1974）。追蹤恩師四十年。載於張雪門先生紀念專集。台北：治喪委員會編印。117～124。
- 李蟾桂（1974）。幼師三年恩澤長。載於張雪門先生紀念專集。台北：治喪委員會編印。125～130。

- 金恆娟（1988）。幼教工作六十年—先師張雪門生平事迹略。幼教史話。61~76。北京市教育局幼兒教育研究室。
- 翁麗芳（1992）。近代中國における幼児教育の形成と展開——張雪門の台灣幼兒教育に与えた影響について——。東京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学位論文。（未出版）
- 張香山（1994）。傳薪哪惜山河遠。載於戴自俺主編（1994），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 下卷。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1446~1450。
- 張雪門（1930a）。我國手指遊戲在教育上的價值。載於戴自俺主編（1994），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 上卷。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565~586。
- 張雪門（1930b）。我國現時最需要的是何種幼稚園教育。載於戴自俺主編（1994），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 上卷。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110~116。
- 張雪門（1936）。幼稚教育新論。上海：中華書局。
- 張雪門（1952）。幼稚園行為課程 上、下篇。台北。
- 張雪門（1955?）。幼稚教育講義。台北：僑務委員會。
- 張雪門（1969）。幼稚教育五十年。台灣書店。收於戴自俺主編（1994），張雪門幼兒教育文集 下卷。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1201~1221。
- 張雪門（1982）。幼稚教育論叢。台北：台灣開明書店。二版（初版出於1973）
- 張雪門（1973）。論幼教師資考試檢定。載於幼稚教育論叢。台灣開明書店。185~186。
- 陳約文輯（1974）。院長和我們。載於張雪門先生紀念專集。台北：治喪委員會編印。178~180。
- （張雪門二戰前發表於北京《晨報》、上海商務印書館《教育雜誌》；二戰後刊載於台北《中華日報》、中國幼稚教育學會《幼教通訊》、《幼兒教育》、中華民國婦女聯合空軍分會《幼教輔導月刊》共計一百三十七篇文章省略）